

論語 百則

ONE HUNDRED QUOTATIONS FROM THE ANALECTS

冯大建 / 编注

王健 / 李盈 / 谢琰 / 翻译

EDITED BY FENG DA JIAN

TRANSLATED BY JAN WALLS, YVONNE LI WALLS, YIM TSE

南开大学出版社



ONE HUNDRED QUOTATIONS FROM THE CONFUCIUS

• EDITED BY FENG DAJIAN • TRANSLATED BY JAN ~~WANG~~ YVONNE D'WALL, YIM TSE

论语百则

冯大建 编注 • 王健 / 李鹰 / 谢琰 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百则 / 冯大建编; 王健, 李盈, 谢琰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310-02028-6

I. 论... II. ①冯... ②王... ③李... ④谢...
III. 英语—对照读物—汉、英 IV. H319.4: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087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河北昌黎人民胶印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

印数 1—2000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论语》是我童年时所读的第一册启蒙读本,也是对我平生影响最大,使我受益最多的一本书。我自幼年就经由父母亲自教导认了不少字,也背了不少唐诗。及至到了入学的年龄,父母没有送我去一般的小学读书,却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我读“四书”。而第一册读的就是《论语》,所请的教师也并非外人,就是我的姨母,所用的课本就是当时坊间常见的朱熹(1103~1200年)的《四书集注》。姨母觉得我年纪还小,所以在讲书时并不斤斤于字句训诂的研求,而只着重于说明其义理之大略,而我对于书中之义理虽然并无深刻之了解,但却对之极感兴趣。

其后我常常回想,我大概是一个生来就对于人生的种种问题喜欢思考和反省的人,“思考”当然还是属于客观的少年求知的思索,而“反省”则是颇为主观的,想要将所学之义理在生活实践中求得印证的一种反思了。记得当我初读《论语》时,对其中之深义虽然并不能理解,但却已经有了一种要想将其所言之义理在人生中求得印证的朦胧的追求和向往。那时我对于《论语》中所谈到的种种为学与为人之境界,自觉有的尚颇可体悟,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及“吾日三省吾身”之类,就是我可以理解和印证的。至于像“仁者不忧”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类,则是我自觉尚不能完全理解和印证的。而就我的天性而言,则是偏偏对于这些未能全解也未能印证的事物,有着更大的想要一探其究竟的好奇心。我应该感谢我早年所接受的以熟读背诵为主要的传统教育方式,这使得我对于当时所读诵的书,无论懂与不懂,解与不解,都一概深深地印入了脑中。《论语》既是我最早背诵的一本书,也是我最为熟记的一本书,因此当我在此后数十年的人生路途中,无论遇到任何困惑或苦难时,常常就会自然

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在头脑中闪现出来，而我也往往就由此一两句话，而对所面临的困惑与苦难得到了答案和解脱。

不久前，当我为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我的《叶嘉莹作品集》撰写序文时，还曾提到在抗战（1937～1945年）后期北平沦陷区的艰苦生活中，我虽然不得不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然而却能不以为耻，吞食难以下咽的混合面，也能不以为苦，那就因为当我面临这些情境时，自然就会有《论语》中所说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及“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一些语句，立即涌现脑中，而这些语句，当下便可以给予我以一种精神力量，使我对于衣食之艰苦都可以不复介意。

而且，因为我对于“四书”都曾熟诵，于是我就更可以从在贫苦中何以自处的一种反思，而联想到“四书”中其他的一些语句，如《论语》中所说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也就是说“不仁者”不仅不可以长久处于俭约贫苦之中，甚至于也不能长久处于富贵享乐之中。于是我就又想，如果说俭约贫穷是苦，所以“不仁者”不能长久安贫；那么富贵享乐就应该是福了，何以“不仁者”竟也不能长久处富呢？于是我就又想到了《孟子》中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语句，以及《中庸》中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等语句，因而乃体悟到所谓“仁”者，一定是内心中自有一种安身立命的自得之处，如此方能不被外界一切物质环境所左右。

于是我就又联想到这种融会贯通的体悟，也应该正是孔子所极为重视的一种教学方式，所以孔子就也曾说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话，也就是说求学之道原贵在有“举一反三”的联想和体悟。而这种联想的作用，在诗歌之教学中则尤为可贵。所以在《论语》中，孔子（前551～前479年）就曾赞美子贡（前520～前450年）与子夏（前507～前420年）两个弟子是“可与言诗”的人，那就因为子贡可以从孔子所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两句谈到做人修养的话，联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诗；而子夏则从孔子对“素以为绚兮”一句诗所作的“绘事后素”的解释，而想到了“礼后乎”的做人的

修养。

所以孔门论诗,特别注重“兴”的作用,既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我想大概正是由于我在幼年时受了所诵读之《论语》中的这些言语的影响,因此当我以后教授诗词时,才会特别注重诗歌中之兴发感动的作用,而且这种感发往往与人生之体验和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我的眼中看来,不仅诗歌中充满了活泼的感发之生命,《论语》一书中也同样充满了活泼的感发之生命。而我平生读书的最大的乐趣,就是从所读的书中,去探求和体会这一份活泼的可以使人的精神提升起来的生命的力量。而也正是从这一点来说,《论语》乃是对我平生影响最大,使我受益最多的一本书,而且随着年龄和生活体验的累积,我对于当年所不能理解的“仁者不忧”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等言语,也开始逐渐有了理解和体悟。不过,使我惭愧的则是,我从《论语》一书受益虽多,然而对于弘扬《论语》一书之教学方面,却未曾尽过丝毫的力量,下面我就将对我在这方面的亏欠,也略加叙述。

其实,当我为自己的《作品集》撰写《序》言时,我就已曾对自己为学的不足之处做过一番检讨,说:“我一向并无大志”,而且对于自己也“从来未尝以学者自期”。所以对于《论语》一书,虽然由于童幼年时的熟诵,而使我终生受益无穷,然而说来惭愧,原来我却连我幼年所读的《论语》一书的朱熹《集注》都未曾好好研读过。数十年来我一直海内外各大学讲授诗词,为了教研需要,我也经常撰写一些评诗说词的文稿,在教书和写稿时,也往往引述一些《论语》中的言语,这些言语都是因为我的熟诵,而在讲课或写稿时自然涌现出来的,我实在并未曾对这些语句在任何注本中做过研考。

有些友人和学生因为常听我征引《论语》一书,也曾向我提出过讲授《论语》的要求,而我自己则因为对《论语》一书及儒家之思想,都并未曾做过有系统的学术性之研究,因此乃迟迟不敢应承。此次之编选《论语百则》一书,盖实出于蔡章阁先生之倡议。我与蔡先生之相识,则是由于前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谢琰先生之介绍。

原来我自 1993 年蒙南开大学邀请成立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之后,因创建伊始,困难颇多,谢先生之夫人施淑仪女士曾从我学诗,是以彼夫妇二人,对于我创建研究所之困难颇为关心,因而乃与蔡先生言及此事,蔡先生遂慨然捐资,不仅为研究所兴建了教学楼,而且以为研究所仅以中国文学为主,范围未免过狭,乃倡议将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而以儒学及文学之研究为两大重心。

而蔡先生所尤为关注者,则是对于青少年的学问品质之感化及教育。我于数年前既已曾与天津友人田师善先生合作,编有《与古诗交朋友》一书,作为青少年学诗之入门读物,蔡先生因倡议编撰《论语百则》一书,以作为青少年儒学之入门读物。我因自惭对儒学并无深入之研究,乃请求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洪教授予以协助,由陈教授所指导之高材研究生冯君大建编成此书。而且为了将此书向海外所有热心于学习中华文化之人士推广,更商请温哥华西门大学之教授王健(Jan Walls)博士和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中华语言文化部主任李盈女士,及兼任教授谢琰先生共同合作,将此书译为英文,而南开大学则更表示愿负担出版此书之全部费用,行见此书出版后,不仅将成为海内外之有志于学习中华文化者之一册宝贵的入门津筏,而且对于提高青少年之品质必将发挥极大之功效。则我虽自愧对儒学并无深入之研究,但作为一个自幼诵读《论语》之极大受益者,能有幸在此书之倡议及编撰之前后有一段介入之因缘,既乐见其成,乃更为文略述其始末如此。

本来,这一篇《前言》写到上面,已可告一结束,但我却想藉此机会对于青少年之有心于诵读《论语》者,再说几句话。那是因为我近日为了撰写这一篇《前言》,因此就又找了一册朱熹的《论语集注》来阅读。而方一开卷,就在开端的《论语序说》中发现了几句极值得注意的话,那是朱子所引的程颐(1033~1107 年)的几段话,其中一段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有一段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

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可见古人对《论语》一书之诵读，其所看重的原来乃是一种变化气质的宝贵的作用。而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传统之教育与今日之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差别。传统的教学所注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而今日之教学所注重的则是知识之传授。

即如《荀子》之《劝学》篇，就曾经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及“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的话。所谓“以美其身”，所指的乃是身体力行以求人格之完美的“为己”之学；而所谓“以为禽犊”，所指的则是以学问为手段去追求名利的向外面去谋求的“为人”之学。蔡先生之所以倡议要编撰一册《论语》的普及读物，其理想就正在于希望可以使青少年们在诵读此一册读物时，可以自其中获致一种“以美其身”的变化气质之效果。所以这一册书中所选编的可以说都是有关日用常行的一些基本的处世为人之道。《论语》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其语言之简短，而且可以各自独立成章。悟到一句话，就有一句话的受用，而且所悟之道可以随年龄与体验之不同而与日俱进。希望青少年的读者们，都可以从这一册书中得到可以终身受益的宝贵的收获。

叶嘉莹

序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脊梁,它支撑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规范了中国人的思想形态,构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它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发展、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它的主要源头,就是《论语》。

《论语》之为书,其言也精,其思也深。它记述孔子伟大的仁学思想,是儒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其义理所论,遍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其思想不可不谓博大。自汉至清,两千余年,《论语》始终被奉为经国之基、立身之本。其泽霈所至,上迄大夫卿相,下及贩夫走卒,其影响不可不谓深广。

儒学思想自产生以后,以其独特、宽容的理性精神,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要素,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造,绵延千年却仍保有鲜活的思想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汉有经学,宋明有理学,清有朴学;时至今日,又有海外诸君子倡导“新儒学”,力图发挥儒学思想于科技昌明之世,救治物欲之弊。这种独特、宽容的理性精神,就蕴涵于《论语》之中。它奠定了儒学的学术品格,不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核心思想,而且使儒学在这个信息时代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论语》中的理性精神,作用于个人,抽象而言,其表现有三:悲天悯人之仁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毅、允中持重之中庸。仁爱之心使人自觉履行社会、人生之责任,勇毅之德使人可担重任、行远途,中庸之道使人心态平衡、取舍有度而行事稳健。

千百年来,对《论语》的注、疏、译、释,不可计数,其规模、数量,在西方历史上恐怕只有《圣经》能与之堪仿佛。作为现代的中国人,选译《论语》,决非仅仅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宣扬中国文化,更因为《论语》和孔子深邃的思想确实有益于人生,有益时代。

益于修身、利于当代,这就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初衷和编选的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把编选的重点放在了《论语》中探讨做人、修身、处世、学习的篇章上。另外,孔子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不易理解,所以没有多选,仅保留少数代表性篇目。《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孔子的轶事和人物评点的篇目,由于这些篇目意义比较隐晦,而且与很多历史掌故相联系,所以也未收录。

本书得以出版,得益于香港士绅蔡章阁先生的倡议。蔡章阁老先生原籍广东潮州,生于1913年。出身清寒,早年失怙,却始终苦学勤修,自强不息。14岁即随叔父习商,远赴香港,发展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蔡先生认为繁荣经济、充裕民生,需工商并重,故于香港创建工厂,经营铝业制造,成为香港实业巨子。蔡章阁先生历任中华总商会会董、中华厂商商会会长、潮州商会会长、中国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57年,率领香港代表团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香港工业出品展览会,代表香港参加马来西亚独立大典。

蔡先生除勤于事业外,始终热心教育和福利事业,1949年出任香港保良局总理;1956年任中华厂商联合会财政部长时,竭力筹措巨款捐献香港政府,兴建工业学院(即香港理工大学前身);1968年筹建蔡章阁职业先修中学。近年来,蔡先生因年事已高,息居加拿大,虔参佛法,然对普及中华文化事业尤为关注,对文化教育事业多有捐助。自1990年开始,蔡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设立多项奖学金,包括工商管理、工程、医学、教育及佛学等,积极参与扩建亚洲研究院,资助建成蔡章阁大楼,并于1997年荣获卑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蔡先生还曾向中国南开大学捐资数百万元,筹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提出了为广大青少年,包括广大海外华人子弟编选一部《论语》读本构想。是年,笔者正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经陈洪导师的推荐,在叶嘉莹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这本书的编选工作。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本《论语百则》编选完成、刊行问世之时,蔡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了。为了纪念蔡先生,在序言之后,我们收录了施淑仪女士的《仁以为己任的蔡章阁先生》一文,以表达我们深深的怀念。

民族文化是人类精神的故乡,我们生与斯、长于斯,只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知道今天的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继承、宣传、发扬传统文化,就是在建设我们民族的明天。许多志士仁人,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为发展、宣传儒学思想作出巨大的贡献。蔡章阁老先生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今天,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儒学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显学。也正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昌盛的希望。

冯大建

仁以为己任的蔡章阁先生(1913~2000)

我们与蔡先生由文字结缘而相识,往事依稀,前尘如昨……

1992年,一个晴朗的春日,蔡先生致电外子谢琰工作的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说很欣赏他的书法,原来他在雕刻家王克文处,偶然购得一副木刻对联,对联所刻正是谢琰的书法作品。不久,蔡先生相邀晚膳,席间表示希望谢琰以小楷为其先考妣书写生平事略,并出示亲用毛笔撰写的手稿,自言幼时家贫,少年辍学从商,随叔父学做生意,请我们为他的手稿大力删改。我们与蔡先生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成功的工商企业家,现在亲及拜识,深感其为人坦率诚挚,谦逊而礼下于人;其所撰写之先考妣生平,亦复文字质朴,孝思洋溢,至为感人。适逢叶嘉莹教授从天津南开大学返温哥华度暑假,机缘难得,遂将蔡先生文稿转交叶教授,经她稍加润色,谢琰以小楷恭录,完成两幅工整的先考妣事略。由蔡先生送返家乡潮州,供奉于祠堂,俾使先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得永为后世子孙之楷模。

蔡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多年,热心侨居地的公益,对当地的医疗、教育与佛教团体的捐献,不遗余力,平居淡泊,自奉俭朴,虽然身在海外,而乡国之情常系于心,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的推展,时刻念念不忘,故在香港早有厂商会蔡章阁职业先修中学之创立,为选择就业的少年学子,提供多元文化的中学课程,包括普通学科与工商技能的训练,本“诚信勤毅”之旨,策励有志向学的少年,藉以奠定德智并重的教育基础。在加拿大温哥华,蔡先生又为卑诗大学捐资兴建亚洲研究所,并因为研究所一项发展计划,须向大学提交建议书,又与我们相约聚会,我们觉得兹事体大,乃邀叶嘉莹教授一起商议,此为蔡先生与叶教授相识之

始。蔡先生提出他对亚洲研究所的构思与理想,谓此一研究所共分为五大中心——中国、日本、韩国、南亚及东南亚,希望通过亚太五个重要地区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西文化之融会,蔡先生又从孔子的故乡山东运来泰山之石五方,分别镌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各附中英对照之箴言,使中西人士及负笈之莘莘学子,均能流连其中,涵泳儒家之精义,我等对其构思与理想之高远,均极表钦仰。

蔡先生除捐资兴建研究所外,历年来更在卑诗大学各学院捐设无数奖助学金。卑诗大学于1997年授蔡先生荣誉博士学位,叶嘉莹教授曾撰联奉贺:“德教久传名,百岁树人功不朽;琼林今开宴,九如称颂祝长年。”叶嘉莹教授为卑诗大学终身教授,自1969年在亚洲系讲授诗词至1990年退休。退休后,著述不辍,且不辞劳苦,经常前往世界各地讲学,又应南开大学之邀,成立“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并将自己退休金之半数,在南开大学设立奖学金,旨在培育优秀的古典文化教研人才,唯教学与培训所需之校舍与经费均无着落,叶教授自退休后也经常在加拿大温哥华之中华文化中心讲学,有一些不理解她的人,认为她已逾70高龄,应该在家安享晚年,而仍然四处奔波讲学,难道真是“学不厌,教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她感慨地诉说,她不是不知“老之将至”,而是深知“老之已至”,愿将向晚的黄金岁月继续奉献在讲学及传播中华文化之工作上,尤其盼望培训优秀的师资,为传统文化继往开来。我们被叶教授全心奉献,浑然忘我的精神感动,也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与几位热心的友人,朱宗宇、刘和人、陶永强、梁佩等组成“中国古典文学教研人材培训委员会”,又以其与“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的宗旨相符,遂加入该基金会,成为属下会员。我们深感蔡先生对传统文化所怀抱之理想与襟怀与叶教授无异,乃将叶教授的心愿向蔡先生陈述。犹记蔡先生精神好的时候,曾策杖亲临叶教授的讲座,端坐听讲逾两小时,他虽然年高体弱,但尊师好学的精神,已达到忘忧忘病的境界。当蔡先生知悉南开大学预备在校

园划出土地,并愿意随时拨出相应于募捐的资金,作为兴建该研究所教研中心之用,乃慨然允诺与南开共同承担建筑经费,并征得叶教授同意,将研究所易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分设儒学与文学两个研究中心,由叶教授任研究所所长,主管古典诗词部,儒学部则交南开大学与叶教授共同物色人选,期望儒家忠恕仁爱的精神,再度浸润中国人的心灵,成为中国人不断向上的精神力量。蔡先生又捐资在大楼前树立盘山之巨石一方,镌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古训,俾使自强不息的精神,得以在历劫的神州大地,巍然矗立,前进不已,此因蔡先生悲悯天人之宏愿也。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之教研大楼行将落成之际,蔡先生又请叶教授为幼少年编选诗歌读本,叶教授因早与天津田师善先生编辑了一册《与古诗交朋友》,共收五七言古诗 100 首,遂建议另编选一册幼学《论语》选读,蔡先生欣然同意,叶教授遂在《论语》中选出有关仁、义、礼、智、信的章节,共 104 则,与南开大学文学院陈洪教授共同指导南开中文系研究生冯大建君撰写白话语译及意义浅说,编成《论语百则》,由西门大学的王健教授与李盈女士及谢琰共同译成英文,南开大学为纪念蔡先生,决俟《论语百则》的英译完成后,尽快付梓,藉以告慰蔡先生在天之灵。

我们与蔡先生相识之初,蔡先生年已耄耋,扶杖而行,近年体力更趋衰弱,双足乏力,起坐均需人扶持,夫人又抱病,每次做客蔡府,见蔡先生对夫人饮食起居的亲挚关怀,令人深深感动。我们与蔡先生聊天,听到佛堂传送诵经的梵音,看到蔡先生脸上祥和欣悦的微笑,便知道他全心投入社会公益与文教事业的捐献,秉持儒家立己立人的精神,自强不息,终身为一种道德使命而努力承担,故能忘却一己之疾苦,真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陶渊明诗)。这 10 年来,我们有缘与蔡先生交往,他一生的行谊,将永远是我们立身行事的典范。

蔡先生于千禧年九月往生极乐,犹忆昔日拜访蔡先生,告别时,多礼的蔡先生总是扶着拐杖亲到门前相送,如今我们在愿断法

师所主持的诵经仪式中,最后一次与蔡先生辞别,那一句句梵音,仿佛幻成天边五色的彩云,在向晚的夕阳中,馀晖不灭。

施淑仪

Foreword

The *Analects* was the first primer I read in my childhood. It was also the book that influenced my life most, and offered me the greatest benefit. As a child, I was taught by my parents to read many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emorize numerous Tang poems. When I was old enough to enter school, instead of sending me to the usual primary school, my parents engaged a tutor to teach me *The Four Books*¹, and the first book I studied was the *Analects*. The tutor they employed was not an outsider, but my aunt, a sister of my mother. The textbook she chose was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which was quite commonly found in the bookstores then, annotated by Zhu Xi (1103—1200). My aunt felt that I was too young to comprehend the text thoroughly, therefore she did not explain the meaning of each word, but explicated the principle of each quotation in general. Although I understood little of the principle, I was greatly interested in the *Analects*.

Later, I often wondered if I was a person who was born to enjoy contemplating and reflecting on various problems in life. Contemplating is an objective means of youth in quest of knowledge, while reflecting is a subjective process. Reflecting is a form of rethinking that is accomplished by finding examples in daily practice to prove the principle. I recalled that in my initial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I did not understand some of its profound ideas. Nevertheless, I was vaguely inspired and longed to search for examples in life to prove the *Analects'* principles. At that time I became quite conscious of my realization of various

state of mind in learning and conducting myself as depicted in the *Analects*. For instance, I was aware of the meaning and how to find the confirmations for such quotations as, “Isn’t it a jo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then review and practise it from time to time?”, and, “Each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 [In doing things for others, have I failed to do all that I could do? In my interactions with friends, have I been untrustworthy? And have I failed to practise that which I have learned?]” As for sayings such as, “The humane do not become worried,” and “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my heart’s desire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bounds.” I was conscious t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m completely, nor was I able to find proof in life. It is my curious disposition that leads me to look for answers to problems, which I do not comprehend completely or to seek proof for things unproven. Thanks to my early education, which relied mainly on learning by rote, I was able to memorize what I had rea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I understood them. Since the *Analects* was the earliest book I learned by rote, and it was also the one I thoroughly memorized, whenever I faced difficulties and sufferings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of my life, one or two qu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ten flashed into mind providing me with answers and relief for my predicaments.

Not long ago, when I was writing the preface fo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eh Chia-ying* to be published by the Laureate Publishing Company in Taiwan, I wrote about the hardships I suffered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1937—1945), when Beijing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Although I had little choice but to wear patched clothes, I did not feel ashamed. Nor did I consider myself to be suffering when I had to swallow inedible noodles. When I faced the hardships, quotations from the *Analects* came naturally to me, such